

# 喧嚣躁动下的寂寥:关于“新民歌运动”

史竞男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04] 08—0082—02

1958年4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的要搜集民歌的意见,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这场历史上罕见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诗歌创作运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引发了许多讨论,但似乎仍有一些未理清的问题。通过对“新民歌运动”这一建国后十七年中的重要文学现象重新做了一番梳理,我发现“新民歌”在喧嚣躁动的表象后面,竟是与狂热的时代精神相悖并形成强烈反差的寂寥与荒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的“大痛苦和大悲壮”。

## 一、繁荣表象背后的荒芜

在这场规模盛大的民歌运动中,各地出版了大量歌谣刊物和民歌选集,许多工厂和公社也都出版了自己的民歌集子。据统计,仅1958年的大半年间,全国省市以上正式出版的本子就近800种。除此之外,各地举办的各种形式的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等活动不胜枚举。新民歌的各种出版物和相关组织、活动数量惊人,“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sup>①</sup>是对新民歌运动蓬勃展开的真实描述。在这一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民间歌手,如王老五、黄声孝、殷光兰、霍满生等,真是“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诗人队伍的庞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奇观。新民歌运动似乎是民歌创作自身的空前繁荣,但在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却是一片由贫乏、单调、空虚构成的荒芜,显现出来的是虚浮与苍白。

新民歌从内容上看,应该说总体上体现了50年代末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表达了对祖国、对党、

对领袖的由衷热爱和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由衷喜悦,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欢快热烈的情绪。这种情感的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种可贵的、真挚的情感一方面由于受当时那种火热的“大跃进”表象的感染和欺骗,另一方面,由于受新民歌创作运动发动者们的引导和鼓动,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几近痴迷的盲目和几近痴癫的狂热。新民歌创作几乎千篇一律地为“大跃进”欢呼歌唱,千篇一律地表达着一种躁动、热烈的情绪。典型的代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食堂钢一般,暴雨淋不垮,狂风吹不散,越办人越欢”……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这种盲目性和狂热性使新民歌创作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题材上的丰富多彩和情感上的含蓄细致。狂歌滥颂让人感到的是单调和刺耳。

艺术手法方面,除了个别民歌富有诗情画意或想象奇伟、艺术水准较高外,大多数民歌审美意象单一,表现出来的荒诞的想象力和极度的夸张滑稽可笑。例如写大丰收的作品:“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卡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虽然新民歌的作者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创作主体的文化水平限制了艺术水准所能达到的程度,因此不应对新民歌在艺术上做太高要求,但明显受到当时政治上浮夸影响的脱离实际的妄想和过分失真的夸张,已与说大话、吹牛皮无异,毫无美感可言。让人在感到可笑的同时也感到了几分悲哀。

收稿日期:2004—03—08

作者简介:史竞男,复旦大学中文系。

可见“新民歌”失去了民歌最为宝贵的自然、真实、质朴、单纯的品质，它“高昂豪迈”的格调其实反映的是创作者的盲目和迟钝，是一种非理性的迷狂。

虽然我并不赞同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新民歌的情感虚假不真，是用矫情压抑真情实感，用神话代替理想，借以回避现实中的矛盾的观点；在我看来，新民歌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党、对新社会的热情颂扬，流露出翻身后的幸福喜悦，这种幸福感确实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是真正的“我手写我心”，如王老五所说的那样“写诗哪有窍门，就靠自己心里生，写出来是自己的心里话”<sup>②</sup>，但是我更认为，这种真情实感比虚情假意更为可怕，因为在这种因煽动、误导而产生的情感冲动下，创作者们已丧失了个人的分辨能力和思考精神，这种不自觉的“盲从”心态比那种自觉的撒谎造假、阿谀奉迎更令人感到无奈和悲哀，千篇一律的溢美之辞不仅仅象征着艺术个性的泯灭，更是民族劣根性的体现。

因此，新民歌繁荣表象的背后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片荒芜。

## 二、喧嚣争论之中的空白

新民歌运动自产生之始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以往的争论大多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新民歌的创作方法、形式和发展道路，以及艺术水准。而现在的讨论则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向诗歌创作主体和价值取向。然而我认为，诸如此类的种种讨论虽然都在各自特定的领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对于新民歌运动自身来说，却没有抓住它的关键，没有揭示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文学现象的本质及留给后人的启示。我们对新民歌运动已有的讨论缺少足够的反思。喧嚣争论中依然存在空白。

现在的讨论中很多文章把议论的焦点集中在诗歌的创作主体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新民歌的作者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而非知识分子，因而改变了以往诗歌清一色的由知识分子创作的面貌，诗歌创作发生了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民间话语取代了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曾长期被排斥在诗歌创作队伍之外的普通老百姓接近了知识分子垄断的文化圈，获得了平等创作的权利，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我认为，这也未必。民间话语取代精英话语只是最高领导者的主观愿望，这种试图“取代”的努力既非出于“民间”的要求，而且在客观上取得的效

果也十分有限。这样的想法只能作为“理想”存在，精英话语不可能被取代，否则它也就失去了命名的意义。另一方面，新民歌运动的创作者是否真的获得了平等创作的权利？他们的诗歌能否代表真正的可以作为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相提并论的民间精神？客观上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新民歌在产生之初，它本是劳动人民心声的自然流露，但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它在“大跃进”中走向了极端，“显示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形式的粗暴入侵”<sup>③</sup>。这种历史命运决定了新民歌的最大缺陷不仅仅在于它违背了民歌的本质和精神，也不仅仅在于它用集体主义代替了个人主义、否认了“五四”以来新诗歌的价值观，而更主要在于它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和感情，缺乏感人的理性的力量，因为民众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盲目鼓吹国家理念，从而在根本上表现出的是文学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丧失，表现出的是真正的民间精神的失落。这正是需要我们对新民歌运动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和反思的。

谢冕认为“若是以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代价，那就会酿成文学的悲剧”，这些悲剧表现为“尊群体而斥个性，尊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sup>④</sup>新民歌运动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得出这样一个带有稍许悲剧意味的结论似乎是对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和繁荣表象的反讽。当然，新民歌也绝非一无是处，它对于民间诗歌的收集整理以及劳动人民自信心的提升依然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文学的活力和希望在于感性的文字背后那熠熠闪烁的理性的光芒。

①徐迟：《1958年诗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②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③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④谢冕：《辉煌而悲壮的历程》（《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一）山东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余克）